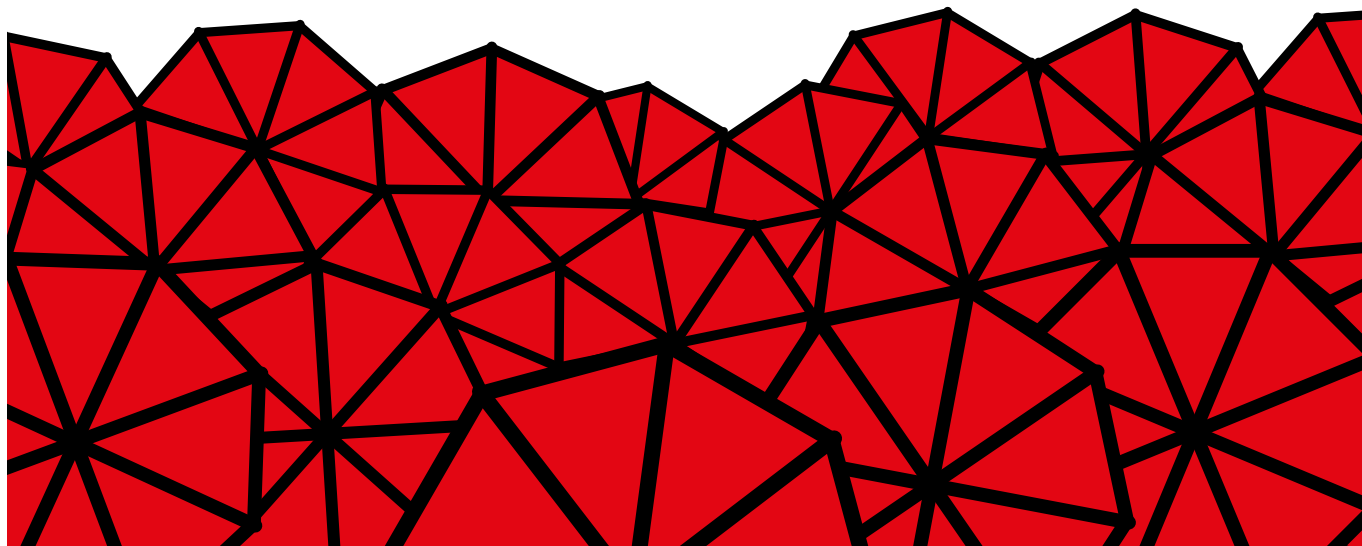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政策简报 刑事定罪对性工作者 艾滋病毒与暴力 脆弱性的影响



刑事定罪对性工作者艾滋病毒与暴力脆弱性的影响

介绍

在几乎世界各地，性工作都以某种形式被刑事定罪，这损害了全球性工作者的福祉。无论性工作是全面刑事定罪，还是只针对一部分刑事定罪，都会造成伤害性后果。本政策简报力图准确分析刑事定罪如何增加性工作参与者面对暴力与艾滋病毒感染的脆弱性。

性工作者遭受了过度的暴力。暴力施害者包括执法部门、客人、伪装成客人的歹徒、医疗人员等机构员工以及同行。尽管关于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的流行病学研究很少，一些区域研究估计在过去的一年中，40-70%的性工作者遭受过暴力。¹

在本简报中，暴力被定义为包括肢体、性和心理/情感暴力。对肢体暴力和强奸的传统理解也包含在这个定义中。为理解性工作者遭遇的各种暴力，本简报也纳入骚扰、强迫，及心理与情感暴力，如污名、言语情感虐待、剥削、强迫和威胁。

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比例也过高。2014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性工作者中艾滋病毒感染率比一般人群高12倍，即使在那些一般人群艾滋病毒感染率较高的国家也是如此。² 很多国际卫生组织达成了共识，即认为去罪化对性工作者的健康福祉极为重要，能够减低他们对艾滋病毒的脆弱性。

世界卫生组织指南提出：“所有国家都应当致力于性工作去罪化，消除针对性工作者的非刑事法律法规的不公正应用。”³ 全球艾滋病毒与法律委员会收到全球上千份口头和书面提案，也达成了相似的结论，指出“刑事定罪，加上社会污名，使性工作者的生活更加不稳定、不安全，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更高。在性工作被刑事定罪的地方，没有法律保护使其免于歧视与虐待”，针对性工作者的惩罚性法律营造了“污名、歧视与剥削的国家制裁文化，以及针对性工作者的警方与客人的暴力”。⁴

艾滋病毒感染只是刑事定罪对公共卫生影响的一个指标。对艾滋病毒的脆弱性也意味着对其他性病的脆弱性。遭受暴力影响了性工作者的身体和情感健康。长期监控、管制和隔离造成的焦虑所导致的情感精神后果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自杀。尽管本简报聚焦于刑事定罪对艾滋病毒和暴力脆弱性的直接影响，但并不否认在刑事定罪社会中生存对心理的影响，而是认为这需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对性工作刑事定罪是造成脆弱性的相关结构性因素之一。大量文献探讨了性工作法律及其对艾滋病毒传播的影响，所显示的共识是：

无论从整体来看还是只看艾滋病毒传播，模型显示性工作去罪化能够对艾滋病毒传播产生最大的影响，未来十年通过去罪化对暴力、警方骚扰、工作环境安全和艾滋病毒传播路径的影响，能够避免33-46%的感染病例。⁵

很多国际卫生组织达成了共识，即认为去罪化对性工作者的健康福祉极为重要，能够减低他们对艾滋病毒的脆弱性。

1 Kate Shannon, 《暴力、安全套谈判和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毒性病风险》，美国医学协会期刊, 304:5 (2010): 573

2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14, 《鸿沟报告》, 21

3 世界卫生组织, 2012, 《中低收入国家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毒性病预防与治疗》

4 全球艾滋病毒与法律委员会, 2012, 《权利、风险与健康》, 36-37

5 Kate Shannon等, 《全球女性性工作者中的艾滋病毒流行: 结构性决定因素》, 柳叶刀, 385 (2015): 55-71

去罪化能够减少管制、隔离和虐待这些导致性工作者脆弱性的因素，性工作者会更多采取那些在刑事定罪环境中有风险的行为，以减低脆弱性。

去罪化能够减少管制、隔离和虐待这些导致性工作者脆弱性的因素，性工作者会更多采取那些在刑事定罪环境中有风险的行为，以减低脆弱性。去罪化能够创造更好的环境来开展艾滋病毒预防与外展的最佳实践，如同伴教育和社群主导研究及服务；能够减少刑事定罪环境中性工作者及其社群面对的污名、逮捕和直接限制。

为更好地探索刑事定罪对脆弱性的影响，本简报研究了刑事定罪在三个不同阶段的影响：

- 刑事定罪的初始阶段，即在逮捕前对性工作者进行的监控和管治。一般认为性工作者是被刑事定罪的群体。对包括性工作者、客人和第三方在内的被刑事定罪的人群，对逮捕的担忧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在风险判断时，导致他们要比较暴力和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与被逮捕的风险。⁶
- 第二个刑事定罪阶段是因性工作或相关罪名遭到逮捕和正式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包括逮捕、庭审和监禁。
- 刑事定罪的最后阶段是释放和回归社区，监禁之外的惩罚以及前科带来的影响。

考虑到性工作者被刑事定罪的多种方式，这些遭遇经常是相互重叠的。例如，回归社区后，被刑事定罪过的人群会继续受到监控和管治。定罪后的要求和限制，如保释或禁止出现在某社区，会进一步加强针对某人的监控。

本政策简报审视了性工作相关法律的影响，包括对性工作刑事定罪的法律，以及针对大众的各种导致性工作者被管治和监禁的法律。本简报采用了NSWP成员在网络调查中反映的情况。这些内容和其他报告显示，在一些地区法律和执法措施对性工作者影响极大，包括：

- 反人口贩运法律
- 移民法律
- 公共场所治安法律
- 反性少数法律
- 对艾滋病毒刑事定罪
- 宗教道德法律

6 大赦国际，2016，《性工作者面临风险：关于针对性工作者的人权虐待研究总结》，13

监控、管治和有罪不罚的文化增加了对暴力的脆弱性

在执法行为实施之前，刑事定罪的影响就已经产生。被管治和被刑事定罪的经验影响了性工作者的决策过程，如去哪里找客人，如何与客人打交道。性工作者要权衡被逮捕的风险与遭受暴力损害健康的风险。刑事定罪使性工作者被警方盯住，加深污名与歧视，这都会影响他们与警方、客人、社区其他人和服务人员打交道的方式。执法人员以逮捕威胁性工作者提供钱、性服务和信息。

街头性工作者受对性工作的身体管治影响尤其严重。他们更多出现在警方视野，也更难掌控工作地点，这使他们面临更多骚扰和暴力。

一项研究表明，“30%（女性性工作者）遭受过警方骚扰或正规场所内的工作暴力，而街头或非正规场所工作的则是70%。”⁷ 对四个关于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的地方性研究的审阅显示，在所有地方，与室内的性工作者相比，街头性工作者面临更严重的暴力。⁸ 其中一项在英国的研究显示，室外工作的性工作者汇报的暴力事件是室内工作的6倍。

性工作者要权衡被逮捕的风险与遭受暴力损害健康的风险。刑事定罪使性工作者被警方盯住，加深污名与歧视…

刑事定罪制造有罪不罚的文化

“刑事定罪对报案的能力和意愿有着负面影响，因为（性工作者）认定，他们不会在遭受暴力后得到应有的帮助，而是会因为未登记的交易被监禁。”

——脆弱人群协会（ASOUPEVU），布隆迪

刑事定罪制造了有罪不罚的文化，助长各种人权侵害，主要是身体和性暴力。如果人们担心被逮捕，就不太会去报案，毕竟受理报案的机构也实施针对他们的暴力。如果都知道某类人不待会去报案，或报案也不会得到处理，这类人就会被当做施暴对象。而且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罪犯会用惩罚来对性工作者进行控制和剥削。

有罪不罚的文化，性工作者的报案被忽视，性工作者被骚扰、拘捕、侮辱，或者在报告犯罪的时候被惩罚。当性工作者被看作法律中的“罪犯”，针对他们的暴力就会滋生，就算在他们报告暴力的时候。

尼加拉瓜妇女组织“燕子”将警方在调查她们一个成员被谋杀的案件中的不作为描述为：

“凶手身份不明在逃，但当向警方报案后，他们对事件轻描淡写，非常草率，没能开展调查，声称，既然她是个性工作者，那可能是任何‘客人’……这个就是歧视、污名和不公正。”

——燕子，尼加拉瓜

7 参见脚注5的62页

8 Kathleen Deering等，《针对性工作者暴力相关性的系统性回顾》，美国公共卫生期刊，104.5, (2014): 42-54

女性倡导改变联盟 (AWAC) 表示, 在乌干达, 司法机构通常对报案的性工作者没什么支持, 担心被视为共犯或客人, 这导致性工作者被进一步孤立和边缘化。知道暴力事件不会被报警, 就意味着凶犯和警方都知道对性工作者施加暴力不会有什么后果。

“Micheline 23岁, 和她的一个客人见面。到宾馆房间后, 那男人在性活动前就给了讲好的报酬。Micheline将钱放在她裙子的一个口袋里。在射精后, 该客人要求她付自己钱, 因为她也在性活动中得到了享受, 然后开始打她。当警方到达现场后, 他们将Micheline和她的客人带到了警局审讯。三名警员将带到一个办公室, 强迫她与他们发生性行为, 不然就不释放她。她别无选择只能屈从。”

——西部青年未来 (AJO), 喀麦隆

刑事定罪加剧了针对性工作者的污名, 从而激发暴力。乌干达 AWAC 指出, 由于污名, 暴力行凶者认为性工作者“活该为所做的事情受惩罚”, “尤其是他们知道即使性工作者去报案也不会得到帮助, 而是会被关起来”, 这助长了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

执法部门是暴力犯

性工作者经常在执法人员那里遭到暴力。执法人员作为刑法和行政法的执行者, 高居被定罪的人群之上。刑事定罪让性工作者始终处于被逮捕的威胁之下, 执法人员可能借此索取金钱、信息和性。

由性工作者网络主导和协助的在亚太⁹、加勒比和拉美¹⁰、非洲¹¹、东欧和中亚地区¹² 进行的区域研究记录了警方属于针对性工作者的性暴力、身体暴力和情感暴力的主要行凶者群体。

警方骚扰和逮捕使性工作者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一项对印度性工作者与执法人员互动的研究发现, “向警察送礼来避免麻烦, 被警方拿走安全套, 工作地点被搜查, 以及被逮捕, 这些都与性病症状、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选择收更多钱而不带套以及遭受客人暴力相联系。”¹³ 通过对一个全国范围的针对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毒干预工作的评估, 南非性工作者教育倡导小组也发现仅是降低警方暴力一项因素, 就可以带来性病传染的显著降低。

除身体和性暴力外, 性工作者也受到情感暴力。例如, 一名巴布亚新几内亚性工作者高武大赦国际, 她因客人虐待而报案后, 警方对她说他们不想在她身上“浪费时间”。她没有再因之后的虐待而报警, “如果我被虐待, 我到警察那里, 他们会说‘你活该’”。¹⁴

“每一次我去报警, 最后都是被威胁因卖淫而逮捕或起诉我……下次我再遭到暴力, 我肯定不会去报案了。”¹⁵

——性工作者, 肯尼亚性工作者联盟 (KESWA), 肯尼亚

警方暴力也可能包含公开羞辱, 如发动公众参与类似行动。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组织描述了“中央内部事务总局的新闻服务处领导呼吁比什凯克居民给性工作者拍照, 并将照片交给警局”。这个呼吁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希望通过对性工作者的攻击来扫荡被污名化的社群。

刑事定罪让性工作者始终处于被逮捕的威胁之下, 执法人员可能借此索取金钱、信息和性。

9 UNDP, UNFPA, APNSW, & SANGRAM, 2015, 《权利证据——亚洲性工作、暴力与艾滋病毒》

10 RedTraSex, 2014, 《美洲15个国家女性性工作者的入权状况》

11 非洲性工作者联盟, 2011, 《我会被虐待而我害怕: 非洲四个国家的性工作者在获取医疗服务时遇到的人权侵犯和障碍》

12 SWAN, 2008, 《逮捕暴力》

13 JT Erasquin等, 《印度女性性工作者的警方相关经验和艾滋病毒风险》“Police-Related Experiences and HIV Risk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in Andhra Pradesh, India.” 感染病期刊, 204 (2012): S1223-S1228.

14 参见脚注6第14页

15 KESWA 和 BHESP, 2017, 《我们不是女性吗?》, 12

管治对性工作者风险分析和决策的影响

对性行业的管治也导致性工作者调整自身行为以避免逮捕，而这通常迫使他们处于更高暴力风险之中。两个明显的行为改变是迁移至更偏僻孤立的地点和减少与客人谈判的时间。

为避免被逮捕，性工作者去更偏僻的地方找客人谈价钱。

“为避免指控，性工作者到更隐秘的地方做交易，那里没有足够的预防服务，而且客人还可能拒绝支付说好的价钱……就因为害怕被逮捕。”

——ASOUPEVU, 布隆迪

偏僻地点使性工作者更容易遭到暴力。管治也使性工作者彼此隔绝，减少露面，避免有第三方因她们一起工作而收费。而一些基本减低伤害措施只有在她们一起工作时才能实施。这些措施包括留意警方动作，呼救时互相帮助，分享客户黑名单信息，或为工作的人拿着钱和个人物品。

管治干扰了性工作者与客户的交流谈判。在有警察的地方，谈判时间缩短，很难坚持使用安全套。这让她们迁移至偏僻地点。一项关于与客人谈判安全套使用的结构性限制因素的研究显示，“女性去到远离主要街道的地方工作，是因为当地管治和街区限制……三重压迫致使无保护性行为的比例增加”。¹⁶

显示，“女性去到远离主要街道的地方工作，是因为当地管治和街区限制……三重压迫致使无保护性行为的比例增加”。¹⁶

…“女性去到远离主要街道的地方工作，是因为当地管治和街区限制……三重压迫致使无保护性行为的比例增加”。

“终结需求”政策增加了对暴力与艾滋病毒的脆弱性

有一点极为重要，即使仅对买性进行刑事定罪（所谓“终结需求”模式或“北欧模式”），刑事定罪与脆弱性的联系仍然存在。

终结需求法律导致性行业中的管治增加。在街头性工作区域增加管治三个月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斯戴拉汇报，街头性工作者遭受的暴力增加三倍，“当地警方承认，针对客人的方法对处理该社区的性工作问题没有效果”。¹⁷ 在爱丁堡，对街头性工作所在区域增加管治，在头六个月中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增加了50%。¹⁸

增加管制可能也减少了街头性工作者的客人数量。担心被刑事定罪的客人会改变行为方式以避免被捕，他们会转向网络或室内。街头性工作者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更少的选择和收入。这导致本来就经常遭受暴力的街头性工作者面临更严重的暴力和风险。

性工作者的潜在客户更少，这让她们难以拒绝那些醉酒或看着不好惹的客人。一名社工说这些已经身陷绝望的人更加容易受伤害，“街上的客人变少，这些女人仍需要钱去买海洛因，客人们给的钱更少，要求却更多，比如不带安全套……如果她们真的需要钱，又已经在那里站了整晚，瘾上来乐……她们就会答应”。¹⁹

性工作者，尤其是那些经济更窘迫和那些处于剥削性环境的人，被迫接受更危险的要求，让她们更容易受伤害。

“市场变小让性工作者感到压力，不得不接受更危险的客人，工作更长时间，降低要价，甚至进行不安全的工作活动。”²⁰

——反贩运女性全球联盟

16 Kate Shannon等，《女性性工作者与客人谈判安全套使用时的结构性与环境性障碍》，美国公共卫生期刊，99 (2009): 659-665

17 Sandra Chu 和 Rebecca Glass,《加拿大性工作法律改革》，阿尔伯特法律评论，51 (2013), 118

18 《SCOT-PEP对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场所暴力骚扰的回应》，SCOT-PEP

19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2015,《瑞典模式对性工作者真正影响倡导工具包》，3

20 反贩运妇女全球联盟，2013,《超越供应与需求口号》，33

终结需求法律伴随的时对第三方增加判刑和执法，这使性工作者更加孤立。这些法律制度削弱了性工作者的非正式支持网络，让她们难以彼此警告扮成客人的暴力凶犯。性工作者不断躲避，换到隐蔽场所，这令面向他们的服务更难开展。

由于性工作者仍会因很多其他罪名被捕，如干扰秩序、不当行为或持有毒品等，增加管治不仅使性工作者更容易受到暴力伤害，也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执法人员惩罚。这些惩罚扩大了执法人员和性工作者之间的距离，性工作者感到无法在遭受暴力时向警方求助。感到自身的脆弱，又难以求助司法机构，这使得性工作者寻求第三方支持，哪怕第三方是利用性工作的隐蔽来虐待剥削他们的人。

客人对警方的不信任，也减少了报案。一项报告显示，在终结需求法律事实之后，“以前帮忙举报暴力、强迫和其他虐待行为的客人，现在不愿意去找警察，担心自己被逮捕”。²¹

…很多终结需求的运动将性工作与暴力混淆，这加剧了污名，损害了性工作者对权利的呼吁，将性工作者去人格化。

最后，很多终结需求的运动将性工作与暴力混淆，这加剧了污名，损害了性工作者对权利的呼吁，将性工作者去人格化。一项调查显示“将卖淫视为另一种工作的人更可能关心被贩卖入性工作的女性。那些更喜欢被贩运妇女提供服务的客人，他们和废娼主义者的理念相同，都认为妇女是用品，报酬意味着所有权而不是交换”。²²

监控与管治对艾滋病毒脆弱性的影响

管治与刑事定罪直接影响艾滋病毒脆弱性。必须指出，包括强奸（通常不用安全套）在内的性暴力极大增加了性工作者对艾滋病毒和性病的脆弱性。对关于针对女性性工作者暴力的研究的全球性审阅显示：

在刑事定罪的环境中，工作中来自客人、警方、管理者、皮条客和伪装成客人的歹徒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是艾滋病毒感染和传播风险的最广泛且有影响力的决定因素之一，会引发不坚持使用安全套、客人拒绝使用安全套、安全套使用破损失败，最终会导致艾滋病毒感染。²³

暴力直接影响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由于性工作者经常被形容为疾病传播者，舆论会诋毁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污蔑其故意进行有害行为。多个NSWP成员反映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艾滋病毒阳性的性工作者在我们区域被边缘化、污名化，经常遭到性暴力，在工作生活中遭到攻击和殴打。针对他们的暴力来自他们的客人、亲人、甚至应该保护他们的政府部门。这是对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侵犯，是对人权的无视。每个人，无论何种职业，都有权获得安全和社会服务。”

——COVIE, 科特迪瓦

另外，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还可能被针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法律所刑事定罪，被判处更长的刑期，更多惩罚。

21 参见脚注17第106页

22 参见脚注20

23 参见脚注5第60页

将使用安全套作为证据

“尼加拉瓜警方的愚蠢和虐待使他们没收性工作者安全套，好像拥有或使用安全套是一种犯罪。这完全是对我们保护自身健康不感染艾滋病性病的权利的侵犯。”

——燕子，尼加拉瓜

被记录最多的管治导致艾滋病毒脆弱性提升的路径之一就是安全套、润滑剂和抗病毒药物作为有意卖淫的证据。这种警方工作在全球各地都有记录。²⁴ 这种措施使得持有安全套足以因“卖淫”被逮捕，让很多人误以为拥有安全套就是犯罪。这干扰了外展工作者发放安全套的工作，因为性工作者不敢接受，而且外展工作者也受到警方骚扰。这也让性工作者不敢懈怠安全套。对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而言，还因为害怕而不敢携带药物，这让他们无法在被捕或被拘留时用药物。美国的最佳实践政策项目反映一项研究突出显示20%受访者曾经被搜查过药物。

被记录最多的管治导致艾滋病毒脆弱性提升的路径之一就是安全套、润滑剂和抗病毒药物作为有意卖淫的证据。

刑事定罪对关怀、治疗和项目实施的阻碍

“性工作者在司法工作（逮捕、拘留、审判）的经历，让他们坚定认为自己是被抛弃的。这导致他们不会因强奸暴力而报案，也不去艾滋病毒关怀支持和治疗中心。”

——COVIE, 科特迪瓦

刑事定罪和管治影响了性工作者获取服务的能力。正如前文所述，刑事定罪加剧了来自服务机构的污名和社会拒绝，恶化了人权侵害。医疗服务机构的暴力有多种形式，包括拒绝服务、污名化或羞辱行为，以及要求性工作者进行无关的检测等。在四个非洲国家对性工作者求医的调查显示，有一名性工作者反映性工作者“讨厌去医院，（医疗员工）说，‘我们没时间管妓女’，还说死一个妓女正好减少数量。”²⁵

一名亚洲NSWP成员反映，医疗机构不提供治疗，因为他们觉得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等关键人群一样，都是“无可救药”。

这种充满敌意的服务环境让性工作者不愿意来获取基本医疗服务，包括艾滋病毒检测治疗，未处理的艾滋病相关疾病导致更糟糕的健康后果。

“污名与歧视经常使他们进一步远离艾滋病/艾滋病毒预防关怀项目，导致感染率提升。在我们的社会中，性工作者长期遭受‘矫正性’强奸，被医疗机构拒绝关怀服务，在性活动结束后被不愿付钱的客人攻击，而这些都受到执法人员的支持。”

——西部青年未来 (AJO), 喀麦隆

24 开放社会基金会，2012，《对安全套刑事定罪》

25 Fiona Scorgie, 2013,《我们在医院中受到憎恨：四个非洲国家中性工作者在获取医疗服务时的遭遇》，Peoria Space大学

担心被公开性工作者身份后交给警方，这也阻碍了性工作者获取治疗。

担心被公开性工作者身份后交给警方，这也阻碍了性工作者获取治疗。

为性工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也会受到污名化与歧视。50%的肯尼亚受访者表示警方曾经在他们工作时骚扰他们。²⁶ 污名和刑事定罪影响项目开展。性工作者权利倡导和服务组织的性工作者领导被逮捕或骚扰，组织因为支持性工作者权利而被骚扰甚至关停。很多性工作者组织反映无法注册，或不得不改变组织名称以避免明显可看出是性工作者组织。一名美国艾滋病毒项目官员说他们不得不调整外展材料：

“我们说确实必须有一张无法辨识身份的照片来显示群体（街头性工作者）的存在，但完全没有这种照片。在美国性工作是非法的，这就很难在预防和治疗工作中直接提到这一点。”²⁷

污名也阻碍性工作者全面参与到艾滋病毒项目，违背了健康项目的最佳实践，难以实现同伴基础的教育与服务。“与性工作者实施全面艾滋病性病项目”，即“性工作者实施工具(SWIT)”，是由NSWP和联合国机构协作开发的。该文件指出社群赋权与社群主导服务，包括有效参与到服务设计和提供，都是开发有效艾滋病毒项目的最佳实践。²⁸ 刑事定罪与污名妨碍甚至阻挡了有效纳入性工作者，损害了预防、外展和治疗项目的成效。

发源于刑事定罪而进一步损害全球性工作者获得有效服务的是“反卖淫誓言”(APLO)。这是对通过美国“艾滋病援助总统紧急计划”(PEPFAR)项目获取艾滋病毒资助机构的约束性条款，从2003年起实施。它声明该资助不得用于“推动、支持或倡导卖淫或其合法化”。该誓言对面向性工作者的外展组织工作能力造成负面影响。在孟加拉，性工作者组织DNS的活动中心曾被认定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佳实践”项目，在它的一名国际资助方签署APLO后，就失去了资助。这导致DNS被迫关闭了16家活动中心，只剩下4家。²⁹

在被捕、审判和拘留时的脆弱性

如果性工作者被逮捕，进入司法流程，他们仍容易遭受暴力和健康损害。不仅是逮捕，没收或盗窃财产也会制造更多脆弱性，尤其对那些已经经济紧张的人而言。强制艾滋病毒检测等措施侵犯了性工作者的隐私和人权。被监禁和拘留的性工作者遭到执法人员和政府官员及其他在押人员的暴力。司法流程中有时工作是虐待性的去人格化的，尤其对那些面临更严重歧视的跨性别者来说，脆弱性更明显。

强制艾滋病性病检测

在全球多个地区，性工作者在被捕后被强制艾滋病毒健康筛查，这又是一种人权侵犯，固化了性工作者是疾病传播者的污名和观念。有组织汇报，一旦被检测，他们的艾滋病毒感染情况就会被公开。在希腊，29名妇女被逮捕，遭受强制检测，结果阳性者面临刑事指控。媒体没有获得本人同意就公开了他们的形象和身份。即使没有法律要求，服务机构也会要求性工作者进行检测。世界卫生组织记录了来自俄罗斯和印度的性工作者报告，他们在求医时受到医疗机构冷酷对的，不接受艾滋病毒检测就不提供治疗。³⁰

26 参见脚注24第4页

27 最佳实践政策项目，2015，《没我们参与就不是为我们》，7

28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艾滋病规划署，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与性工作者实施全面艾滋病性病项目：协同干预的实践途径》，5

29 健康与性别平等中心，2008，《美国限制政策对面向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毒项目的影响》

30 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性工作者面临的暴力及艾滋病预防》。第2页。

拘留对性工作者健康的影响

拘留，即使是短期拘留，也会损害个人健康。尤其对需要医疗护理的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而言，获得基本药品或毒品是有困难甚至不可能的。在拘留期间，性工作者可能出现戒断反应，或病程因未治疗而发展。对服用抗病毒药物的艾滋病毒阳性者来说，没有药物的监禁妨碍了治疗依从。一名性工作者将没有抗病毒药物的四周拘留描述为：

“非常糟糕的经历，一直没有服药使我的健康恶化。我的CD4数量下降，体重降低。我回去治疗时，医生因为我不服药对我很严厉，说这种情况我应当说出来寻求帮助。他们试图照顾我，但他们不知道我被捕。这种情况没可能改变，警察总是严苛，不听人讲话。”³¹

——性工作者，KESWA，肯尼亚

根据加纳社区家庭基金会 (CAFAP) 报告，在一次对邻近街区搜查后，性工作者不被允许“保释，包括提供食物和卫生用品。一些性工作者被捕时正处于哺乳期，被迫和孩子在一起被关押”。被监禁者的安全套、针具和其他减低伤害用品都被视为违禁品，不仅不提供，还会被没收，这也增加了在监禁中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

拘留暴力

在拘留时，性工作者仍会遭受其他囚犯或执法人员的暴力。秘鲁的天使蓝公民联盟指出，“如果我们的跨性别同伴被逮捕，他们在牢里被关好几个小时，和其他罪犯关在一起，他们遭到同室囚犯的虐待”。在哈萨克斯坦，性工作者经常在被关闭时遭到警察强奸，或被带到其他片区，受到其他警察的侵犯。³²

有时在“康复中心”的拘留也会让性工作者遭受类似暴力。联合国机构与亚太性工作者网络 (APNSW) 合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性工作者在康复中心“被拘留，与孩子家人隔绝，得不到审判，也不可能上诉。在这些地方，暴力经常来自同屋、警察或其他监狱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被关押者，性工作者处于囚犯等级中最底层”。³³

对跨性别性工作者来说，被警方逮捕还会有其他暴力风险。香港的午夜蓝汇报，在派出所，跨性别女性被当着男性警卫的面脱衣搜身，没有适当性别的衣服，被剪掉头发，再一次脱衣搜身，还得不到激素治疗。有的人被送到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³⁴

移民性工作者被拘留时也会遭到暴力，目前极少数据专门针对拘留所李的性工作者，但报告显示针对移民妇女的暴力整体较高。一项近期针对欧洲中亚女性移民的研究显示，有70%的人遭受过性暴力，来自欧洲官员或专业人员的暴力比例也较高。³⁵

“...暴力经常来自同屋、警察或其他监狱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被关押者，性工作者处于囚犯等级中最底层”。

31 参见脚注15的11页

32 Amelia公共协会，2015，《记录人权侵害》，20。

33 参见脚注9第65页

34 午夜蓝，2016，《被逮捕的跨性别性工作者案例》

35 ICRSE，2016，《监视、剥削、遣返。欧洲中亚针对移民性工作者的权利侵犯》，26。

司法处置后的脆弱性

执法和司法处置可造成长期的脆弱性。罚款和其他类型惩罚可导致经济困难和无法回归社区。公开羞辱和公开性工作者身份会导致家庭和社区排斥。这些伤害会在个人受到执法和司法处置后继续发生，增加对暴力的脆弱性，固化损害个人健康的结构性体系，这对感染艾滋病毒等慢性病患者影响尤其大。

对很多性工作者而言，对性工作的惩罚意味着惩罚外的更多限制，如被禁止进入特定街区，性犯罪记录，罚款费用等惩罚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而他们本希望通过性工作解决原有的经济困难，惩罚后则可能参与风险更高的活动，以支付增加的费用。

在逮捕和监禁纪录可公开获取的地方，这些纪录会阻碍个体获得其他工作或住房等资源。喀麦隆的AJO组织反映，“这降低或完全毁掉了性工作者的经济能力。导致他们没有经济来源支持他们去艾滋病毒预防和关怀中心，获得服务提供的各种益处”。

“在大部分人无法支付罚款的地方，有些案例显示性工作者选择用性来支付罚款。而其中一些人因此感染了艾滋病毒”。

——CAFAF, 加纳

在美国和德国这些国家，新闻中常会有头像，以及全名，还可能有地址、艾滋病毒感染情况或跨性别身份。这会带来污名、虐待和社区排斥。

在美国和德国这些国家，新闻中常会有头像，以及全名，还可能有地址、艾滋病毒感染情况或跨性别身份。这会带来污名、虐待和社区排斥。吉尔吉斯斯坦的组织反映，“性工作者的亲密家属，在从媒体得知情况后，会将他们逐出家门，或施加身体暴力（鞭打剃光头等）。在有的案例中会引发自杀企图，一名性工作者最后进了精神病院”。这种社区排斥将性工作者孤立起来，加剧羞辱和污名，加重刑事定罪造成的对暴力的脆弱性。

遭受司法处置也使性工作者更不愿意向警方报案。虐待与创伤让性工作者不愿求助，以避免再被逮捕遭到暴力。

“一名性工作者2015年三月从女子监狱释放出来，说她到奥兰多时在巴士站被青少年帮派成员强奸。他们打掉她的牙，踢她肋部，把她扔在一个杂货店后面。她没有向警方报案，担心警察又把她弄回监狱”。

——SWOP栅栏之后，美国

建议

- **为促进性工作者的健康与福祉，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必须寻求对性行业的全面去罪化。**刑事定罪是性工作者对艾滋病毒和暴力的脆弱性的主要原因，没有对性行业的全面去罪化就不可能全面应对这两个问题。
- **地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必须调查针对性工作者的人权侵害，可以通过现有的机构或法庭来完成这个任务。**很多报告和反馈显示出大量虐待和暴力来自执法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为了解这些虐待的普遍性，性工作者应当能够使用举报机制。向性工作者社区提供独立监督举报机制，以使其能够反映这种侵犯。
- **性工作者和其他受艾滋病毒过度影响的社群，必须被有效纳入到健康服务的设计实施工作。**艾滋病毒项目的最佳实践依赖于受影响社群的知识经验。为改善艾滋病毒预防治疗工作，抗击艾滋病毒传播，性工作者必须被有效纳入到工作中来。
- **服务机构和执法部门应当对阻碍服务和关怀可及性的普遍污名采取行动。**污名和羞辱是刑事定罪后果，阻碍性工作者（尤其是还有其他被污名化身份的人）获取关怀服务以及向医疗服务机构提供信息。
- **执法部门必须停止将安全套等用品作为性工作的证据。**

结论

刑事定罪增加了性工作者对暴力与艾滋病的脆弱性，严重阻碍了全球性工作者的健康和福祉。各种形式的反性工作法律，损害了性工作者的生活。即使没被逮捕，知道性工作者不愿因暴力去报案，或报案也得不到认真处理，创造了执法部门和普通人的有罪不罚环境。在管治工作中，骚扰和暴力时常出现，尤其是将逮捕当做威胁时。没收安全套和拒绝在拘留时提供药物也增加了对艾滋病毒的脆弱性。公开羞辱促使社群鼓励和歧视性工作者，包括服务机构。

各国政府准备再次审视他们关于性工作的法律，此时必须要看到刑事定罪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些法律加剧了暴力和隔绝，损害了健康，固化了结构性边缘化。全面去罪化是整合的第一步，可改善性工作者的生活，支持他们的人权。NSWP敦促各国政府认真考虑刑事定罪后果影响。

全面去罪化是整合的第一步，可改善性工作者的生活，支持他们的人权。

政策简报是在文献研究和收集来自NSWP成员案例的基础上撰写的。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SC349355

项目支持：

BRIDGING THE GAPS
Health and rights  for key populations

 **ROBERT
CARR
FUND**
for civil society
networks

NSWP是“弥合鸿沟” – 重点人群的健康与权利项目的参与者。我们联合了近百家地方和国际组织，以实现这个使命：实现重点人群（包括性工作者，LGBT人群和毒品使用者）艾滋病/性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普遍可及。

更多信息，参见：www.hivgaps.org